



盧瑋鑾訪問記

香港文學

第3期

1985年3月5日

訪問：許迪鏘·朱彥容

日期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

整理：許迪鏘

■：訪問者

▲：盧瑋鑾

■：對一般讀者而言，談到盧瑋鑾，他們熟悉的是寫散文的小思，近這幾年來，小思的興趣由創作轉移到學術研究上，所出版的著述，創作的比重顯著減少，而多在資料的蒐集、剪裁及編輯工作上見工夫。我們回顧過往的一些作家，如聞一多、朱自清、葉紹鈞等，都是先作者而後學者，這種轉變，是不是到了創作的某一階級，就會自然而來？

▲：這是個大問題，就我本身而言，創作一向就不是我的主要精神所在，我以教書為我的工作目標，教書佔了我最大部份的工作時間，一直以來，創作其實不多，近年來，可以說幾乎沒有。主要原因，是的確將精神和興趣放在學術研究上，埋頭在故紙堆中，是名副其實的故紙，如舊報章雜誌之類，這和創作是背道而馳的。我將全部精神專注於追尋事實的發展、作家的活動，完全沒有想到創作這一回事。所謂由作家轉而為學者，兩者我都不敢當。至於朱自清、聞一多、葉紹鈞諸位的轉變，我倒想從他們的角度談談。就朱自清而

版權為作者及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

言，他在中年以前創作頗豐富，在他快要踏進中年的時候，他已經覺得必須找尋另一條路，其中主因，他自己說得十分清楚，就是面對社會的變動，他不知道應該走那一條路，他害怕複雜的政治環境，又是個好人，沒有具備甚麼戰鬥性，那唯有走一條安全的路，鑽研古典文學最安全，所以他只得轉向。但事實上他是個悲天憫人的文人，到後來他依舊看到社會民生的艱苦，還是忍不住執起筆來。聞一多更無需多言，葉紹鈞則一直主要從事教育工作。可能是有一部份作家，因個性關係，當他們創作了一段時期，發覺沒有新的方向，而要走一條更深入的路的時候，很容易會轉向學術研究。另一些作家到某一階段，創作力也許的確會退減，想繼續努力的話，最安全而又踏實的也是學術研究。我不知道自己屬於那一方面，反正我起初就不見得有甚麼創作力，也就無所謂消失或衰退。我現在倒感到在研究中國作家在港活動這一範疇中，找到自己的樂趣，寧願在這上面多花些時間，不一定是尋甚麼路向的問題。

■：你最初為甚麼會對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活動發生興趣。

▲：有幾個原因。第一個是，很多時會讀到一些作家旅港生活的回憶，如茅盾就提到在香港的活動，有很多作品也是在香滬創作的，但可能是匆忙來匆忙去的關係，實際的情形卻不一定講得清楚，所以我想追尋下去。第二是，時常有人說香港沒有文化，但如果有文化人來過香港，他們應該留下一些痕迹，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出為人忽略了的這些文化活動的確實證據？

還有就是十年前，我參加了香港大學的一個校外課程，主講的是歷史系的一些負責人，他們從舊雜誌和刊物，探討過去香港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等問題，一次我在堂上向導師提出有關文學範圍的問題，導師表示沒有研究，不能在這環節上提供資料，自此以後，我覺得如果有人可以憑舊報刊研究往日的政治和社會，為甚麼我們不可以從中發掘文學的資料？於是決定在這方面深入研究，資料越找越多，越發覺其中天地之大，自然而然地全力投入了。

■：那麼學術研究是不是確實影響了你的創作？

▲：有些人可以創作和研究並行，散文家而又從事研究的，寫的就是學者的散文。我自己的確覺得創作上有困難，我的時間和精神全集中在資料的蒐集上，沒有空閒讓我有比較感性的思維。

■：讀你的散文，會發覺你在古典文學上有深厚的修養，為甚麼你會向現代文學研究上發展？

▲：自小至大，我一直接觸古典文學，由小學開始就讀古文和詩詞。母親對我的影響尤其大，她喜歡詩詞，我未進學校已經讀唐詩宋詞，在大學裏我讀的九張卷都是關於古典文學的，到後來轉向，自己想來也是一件奇怪的事。不過我小學時候的校長，是由北大畢業的，那時有一批北大的老師剛巧路過香港，他招待他們住在學校。這批北大的老師幫他編了一些現代文學的選本。我在二、三年級就讀過冰心、魯迅、蕭紅的散文。那種讀法很特別，比如怎樣描寫雲，是將冰心、巴金等寫雲的文字集中起來讀，要唸要默。相信是在這

時候打好了我對新文學認識的基礎。後來到了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讀書，本來也打算作古典文學的研究，但因為時間關係，加上指導教授退了休，自己只好胡亂看了些書，就在這時候一系列看了很多三十年代的雜誌和作品，當時在香港不容易接觸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學刊物，其中的內容是我從未認識過的豐富，這才確定了我對現代文學的興趣，所以我的起步可以說很遲。

■：你為甚麼會對豐子愷和蕭紅特別感到興趣？

▲：我最感興趣的是豐子愷。自幼就看他的漫畫，初中時讀他的散文，很欣賞他的為人，和他對天地萬物的態度，實際上是喜歡他的人多於他的作品，不過通過他的作品可以更了解他的為人。至於蕭紅，我在京都看過她一系列創作，很驚訝二、三十年代就出現了一個這樣筆法相當新異的作家，她在眼界、取材和技巧上都很有個性，和當時的女作家有很大的分別，到現在讀來仍不覺過時。加上她最後兩年在港生活期間有許多作品，都給遺忘了，所以我想努力將這些資料整理出來。

■：你對作者的研究，主要在於他們在社會所擔當的角色，以及他們的行事和活動，而於他們的文學技巧，探討較少。讀過你懷念唐君毅先生的文章，那麼，你在學術研究上的路向，是否會受儒家思想的影響？儒家重視個人在社會中的作用，談論文學，也往往是以言志載道為主的。

▲：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受儒家影響，不過我自幼受母親教育，現在想來，她也是典型的受儒家影響的人，中國傳統的讀

書人其實很難擺脫儒家的影響。我入新亞後，相信的確受唐君毅先生的影響很大。對人對事的態度，個人與社會和國家的關係，這幾方面的想法，多多少少都來自儒家。即使是創作，也有一種使命感，感到有載道的需要，執起筆來，會想到自己的創作可能對他人有所影響，應該要反映時代和社會的情況。但我並不認為作品本身不重要，要認識一個作家，仍應該由他的作品入手，那才是他心靈的寫照。不過對作品分析、思想研究我是做得比較少。

▲：你的研究不在於文學技巧，主要是在歷史方面。

▲：我承認即使現在我偶然寫作的一兩篇小型論文，也都是集中在提供某一作家的資料上，很少從事作品的分析和欣賞。很多人說我是在做史料工作，我的確是希望能夠提供史料，讓有興趣的人利用這些資料，再深入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。有了資料才可以研究，就如蕭紅，有不少人以為他在香港只寫了《小城三月》、《呼蘭河傳》和《馬伯樂》，其實她還寫了些短篇小說和散文，沒有讀過這些作品，不會知道這時候影響她創作的思想是甚麼，不過這一項工作我是讓研究蕭紅的人去做，我是將資料發掘出來，讓研究有關作者的人加以利用。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做的是甚麼工作。

▲：你會不會滿足於這種工作，抑或你最終的目標仍是通過基本的資料，進一步研究作者和作品本身？

▲：當然希望這樣，但我恐怕來不及了。我現在搜集資料的工作也做得很倉促，也還沒有完成。搜集了資料還要訂正，都

是些十分瑣碎費時的工作，我相信如果我能夠盡力整理好這些資料，將它們交到研究者手上，我已經十分滿足了。

▲：在香港做這方面的工作，掌握資料會不會有困難？或者有其他預料未及的問題，妨礙你的工作？

▲：我現在是研究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活動，可以說是得了地利。雖然歷來外界並不注重有關香港的資料搜藏，發掘起來有一定困難，但大體而言，幸好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保存了一定份量的資料，散失在國內和世界各地的資料，也可以斷斷續續的找得到，大概面貌的資料我已經掌握了。資料很難說怎樣才算齊全，開了頭，就可以慢慢的充實。在香港目前比較令我覺得頹喪的地方，是彷彿只有我一個人在做同樣的工作，那麼大規模的工作如果只有一個人做，會很費時間，我的工作也不能全專注在研究上，還有很多教學的任務要做，進展因而很慢。第二點是，資料發掘出來，要讓其他人看到才有意義，但那些資料能夠在那裏發表呢？發表後，同行的人是否容易看得到呢？香港不像大陸或日本，有專業刊物提供發表這些資料的園地，作品登在上面，包保可以落到研究者的手中。你自己掏腰包，也印不了那許多，印出來也不一定能讓適當的人讀到。現在好像一個人關上門自顧自工作，有甚麼差誤，不能得到及時的指正。時間不足，個人能力有限，沒有適當的發表地方，是最大的困難。

▲：你現在鑽研歷史，會不會與現實生活脫了節。你在文章中曾透露過你的工作給你帶來的困惑。

▲：我現在時常提醒自己不要沉迷在歷史裏面。不過我正在研究的那段時期，有很多方面，如環境、社會的變動和衝激，都跟當前的情況十分相似，所以我常告訴自己，這也是個學習的時刻，我們看見歷史的變化和後果，以之引證現在，用些心思，就可以利用過去作為探索未來的指引。幸好我在教書，必然能夠很容易地回到現實社會中來，因為即使我每星期有兩天埋頭故紙堆中，但仍有其餘五天我要面對現代人，要了解我的學生遇到甚麼問題，他們的思想怎樣，這都有助我保持清醒。只是，我在歷史和現實中跳來跳去，也時有迷惘、不知怎樣自處的感覺。

▲：你研究香港過去的文學活動，覺得香港目前的情況，相比起以前，有甚麼進步？

▲：肯定是有進步。單就出版法例而言，以前管制得很嚴，出版雜誌報紙，一定要有三千元擔保，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數目，還時常需要接受檢查。想舉行集會，要向華民政務司署申請。當時許地山就時常要參加會議，原來他是香港大學的教授，有一定社會地位，所以人們要開會，總是找他出頭去申請。現在當然是自由得多了。

▲：至於文學活動的情況又怎樣？當前的香港文學活動看來仍是在一個小圈子裏風起浪湧，那時候文學活動的影響力怎樣？

▲：我也很關心這方面。曾經訪問過一些二三十年代時辦過文學雜誌的當事人，他們都表示當時也很寂寞，文學只是一小撮人的興趣。到三十年代中葉，不少大陸

作家來港，他們是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宣傳抗日的基地，關心的並不是香港，關心他們的也不是香港人，所以他們仍可說是一個小圈子。不過，那時候他們也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，有些年輕人不滿於腐朽的傳統，對新的刺激產生興趣，因而走上了文藝的道路。四十年代中葉以後，中國作家再次南來，他們更明顯地是以香港為宣傳政治的地方。但無論如何，儘管是小圈子，他們仍有很大的動力，如辦雜誌、組織社團、講習班、小組活動等，有多樣化的活動。反而我覺得現在似乎是沉寂下來。現在情況的特點是四方八面的思想都集中在香港，完全沒有一條政治或文藝路線規範着寫作的人，讓他們有極大的自由從事創作，產生出多姿多采的作品。

■：過往的歷史有甚麼可供我們借鏡？

▲：據這幾十年的發展來看，如果一旦過份遵循某一文藝社團的寫作路線，有時候會產生很大的局限。最好讓具備了一定社會道德標準的作者自由創作，而不是要他們服從某一種規條或宗旨，這樣才有利文藝的多樣化，令作家的創作生命更光輝。

■：你是散文家，讓我們談談散文創作的問題。在過去，散文是文學主流之一，我們熟悉的名家如韓、柳、歐、蘇等，所以能名垂文學史，散文成就給他們的幫助很大。反而在現代文學中，散文的地位似乎不高，說自己是個詩人、小說家，看來就比散文家為光采。你認為散文在現代文學中應佔怎樣的地位？

▲：提到散文，有一個奇怪的現象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寫散文，無論他是詩人、小

說家、戲劇家，都寫散文，但專一寫散文的人，卻沒有誰稱為散文家，也許是以為任誰都可以寫散文，能寫散文算不了甚麼一回事。其實在現代文學中，散文創作的份量相當多，散文也是反映時代、社會以及個人心態最迅速的文學形式，郁達夫說散文最有個性，那麼，每一個有個性的人，如果從事散文創作，就會有一種獨特的風格，使散文變得多樣化。這十多年來散文好像沒有特別的出路，但這是不緊要的。散文主要還是表達個人在社會裏的所思所感，社會不斷變動，新作者不斷出現，散文的內容自然會很豐富。所以有沒有人重視散文，並不一定那麼重要。在外國，散文也日趨式微。詩和小說成了主流，散文退居為資訊傳遞的工具。但因為它比較容易表達感情和生活，依舊是一個應該善加利用的文學形式。

■：就語文水平而言，現在和以前的差別怎樣？

▲：在香港，水平可以說是今不如昔。問題是現在一般人以為只要識字就可以寫散文，以為散文不外「有碗話碗，有碟話碟」。其實好的散文並不如此簡單，我一直認為散文應該精鍊，但寫的和讀的很多時都錯誤地對待散文，以為只要執起筆就可以隨便怎樣寫，拿起作品就應該一看就可以明白，不需思考和嚼嚼，變得好作品沒有好讀者，沒有好讀者，作家又會流為粗疏，成爲一個惡性循環，語文程度日降。

■：現代的作家會不會過於個人化，寫的只局限於自己的生活？

▲：二、三十年代同樣有不少作家專事

個人抒懷小品之作。當然也有另一些作家，如文學研究會的作者，即使是寫個人生活，也很容易將它緊扣人生。我贊成你喜歡怎樣寫就怎樣寫，無論你怎樣個人化。然而個人必然生活在某一特定的社會環境裏，為甚麼你會有這樣的個人生活？那就與你所處的社會休戚相關。現在報章上也有不少雜文極具社會性，問題是不大重視文學技巧，太直接，想到甚麼就寫甚麼。過往的作者，即使是寫社會，也會經過文學的加工，而不是揮筆直書的。

■：欣賞水平和語文程度的低落既成惡性循環，作為教師，你怎樣面對這問題？

▲：從前肯花錢買書看的，可以說，都有一定的文學修養。現在教育普及了，看書的人也增加了，最理想自然是既普及，又提高，但香港目前還不能做到，也很難要求每個人都喜歡文學。目前我教大一國文，學生來自不同院系，我要他們不必將課文當作甚麼文學，而是他們生活範圍以外的另一些人的生活心態反映，如果你想超越自己的圈子，除了交朋友之外，讀文學作品是最好的方法。還有，無論你怎樣理性和功利，你也必定有感性的一面，如果你要滿足這感性，文學能夠給你提供呼吸的空間。文學最大的優點是它必定與人有關，只要你是人，也就應該關心人，應該學會怎樣欣賞文學作品。所謂欣賞，就是如何準確地通過文字直透另一個人的心靈，了解他的思想。我不會將文學說成怎樣的不食人間煙火。

■：你雖然說自己不是作家，但這不是你的主觀願望能否定的，也有不少讀者懷念你當中學教師時寫的文詞親切的文章。

現在你是學者，大學講師，如果能夠讓你重新選擇，你的選擇會是甚麼？

▲：我一定不會選擇當作家。是不是一個學者也成問題。我喜歡當教師。將自己研究得來的成果，經過消化，再傳遞給學生，我感到快樂。我第一個選擇是當教師，然後是做研究。幸有餘力，才執筆寫作。

■：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改變了？

▲：有甚麼改變？

■：比如說，變得沒有那麼感性。

▲：我可一直以爲自己很理性。只有在寫《豐子愷漫畫選釋》的時候，才有一點感性，那感性現在也沒有了。所以我十分適合做資料工作，我可以理所當然的一板一眼的去做。

■：我就是奇怪，既然你寫過《豐子愷漫畫選釋》這類感性文字，爲甚麼現在你的一些文章，尤其是學術性的，好像有些「硬」？

▲：很奇怪，現在寫學術文章時，硬得連自己也不相信，我是不想這樣子的，不自覺的，一下筆就一板一眼。我很想打破這困難，寫學術文章時也得保留自己的風格。我正準備寫戴望舒，打算比較感性的

去寫這個人物，但才開始就發覺腦子裏只充塞着資料，我只想到怎樣將這些資料剪裁得最適當，好讓人知道戴望舒是怎樣的一個人。而不是我接觸過戴望舒這個人，覺得我必須寫他。暑假的時候我也曾經想寫許地山後期在香港的活動，那是在做過他的活動年表之後，我十分感動。一個初期對人生抱着宿命論的作家，來到香港後，爲甚麼變得那麼積極，完全投入工作，沒有浪費一刻鐘？我發現他原來是找到了出路，改變了人生無奈的想法，決定奮鬥，做實際的工作，這是很強烈的個性表現，使我有執筆的激動，但年表做完了，滿腦子又是資料，終於寫不出來。不過我遲早還是要寫的。目前我寫散文的感性，還未能跳進我寫論文的理性裏去。

■：生活上會不會有太多的瑣務，妨礙了你的創作？

▲：以前我的學生多，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，反映了不同階層的生活情況。我也時常到處跑，參與許多活動，所以很容易找到寫作題材。反而是現在只是上課、下課，到圖書館看資料，沒有很好的投入生活，因而欠缺了一些寫作的衝動。我相信生活對創作是十分重要的。



小思攝於一九八四年
(右一)